论宋代书信体类的消长与创新

李　贵　张灵慧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宋代是中国书信文体发展并定型的重要时期,主要的书信体类有书、帖、启、状、简、劄子、尺牍等,其中“书”仍是主要体式,“帖”亦大受重视,传世极多。“笺”已不再属于书信文体,唐代始盛行的“启”和“状”在宋代则继续发展,尤其是“启”,因其应酬性、礼仪性强,与宋代士人仕宦及“举世重交游”之风密切相关,故而应用频繁。“简”与“书”分离,“尺牍”独立,“劄子”从公文变成书信,“叠幅小简”“叠幅劄子”兴起,都是宋代书信文体的新变。今人不明体类之别,在整理宋代书信时容易出错。纵观两宋,北宋对前代书信文体有发展定型之功,南宋则多有转变与创新之处。两宋书信在后世广受推崇,在文体上具有典范意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

关键词: 宋代书信;体裁类别;劄子;尺牍

中图分类号: I 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2)05-0096-11

现代汉语所说的“书信”或者“信”,在中国古代多被称为“书”或“简”,又有书牍、书札、书启、尺牍等称呼。据语文学家考证,两晋南北朝时期,“书信”二字连用,多指“信使”或“消息”,但也已出现“书札”的意义,这与现代汉语的“书信”所指一致。① 由此看来,尽管古代文献中用“书信”统称这种文体的情况并非主流,但最晚在两晋南北朝已出现用例,历史悠久,因此本文用“书信”一词来概括从古到今不断发展的这种人际交往文体。

在书信文体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六朝和两宋是最重要的两个阶段。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纵览古代书信文学,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对宋代各体书信的辨析演变较为详细②,各有创获。此外,对于宋代新出现的书信文体如“劄子”等也有一些专文予以探讨。但总体而言,已有成果对宋代书信文体整体发展与创新缺乏细致的分析和历史性的论证,对新兴书信体类的探讨也不够全面充分。本文将在统计、分析各体书信数量的基础上,对宋代书信体类的消长和创新展开具体论述,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辨明宋代书信在中国书信文学史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

一、宋前书信文体的独立与公私书牍的分化

秦汉以前,书信虽然已有许多别称,但论及文体,皆总称为“书”,汉魏以降,书信文体开始分化。汉末曹丕《典论·论文》提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③,其中“书”一体即包含书信,但书信仍未被作为专门

收稿日期: 2022-03-30

作者简介: 李贵,男,广东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宋文》未收书简辑考暨宋代书简会通研究”(项目编号:20BZW06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永言:《两晋南北朝“书”“信”用例考辨》,《语文学论集(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5—222 页。

②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③ 曹丕撰,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3 页。

的文体提出。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论列书信与笺记等文体,既包括人际往来的书牍,也包含臣僚对上级的各体书札以及各类杂文文书。他注意到书体自秦汉开始依身份而区别,将书与笺记分开讨论①,又将“章表”“奏启”等单独分类论述,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书的文体意识在增强,且书与章表奏启的区分已经明确。稍后萧统《文选》对文体分类更为细致,“文”之体细分为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等多类,其中书、笺二类为私人书信②,所选奏记一篇亦为书信,表、上书、启、弹事则是公文书牍。从《文心雕龙》到《文选》,可以看出南朝时书信文体意识逐步明朗,“书”已独立出来作为书信文体,“表”“启”等公文书牍单独成为一体,且公牍与私牍的区分更加明显,如《文选》将“上书”从“书”中独立出来,在在皆表明各体公文书牍与私人书信开始独立发展。《文选》的文体分类奠定了后世书牍分类的基础,其中多种文体与后世书信文体息息相关,“书”在后世仍作为书信的主要文体,且在文集中与表、奏、上书等公文区分开来,本非书信文体的“启”却在后世成为书信大类,与之相反,奏记与笺则在日后退出书信家族。至于《文选》尚未分类编集的“状”,至唐代则发展为书信文体之一。

同时,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的书信开始注重文学性。从曹丕《典论·论文》看,“书记”之体在建安七子等人手中得到发扬,亦在辞藻等方面有极大发展。此时私人书信亦成为作家逞才使气之文体,曹丕兄弟与陈琳、应璩、吴质、杨修等人往来的书信便是文采情思俱佳之作品,《文选》“书”类收录多篇,皆文采斐然,可见萧统将之视为文学佳作而收录,从这些书信中也能看出作者与受书人都有意识地将书信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和欣赏。诚如褚斌杰所说,魏晋南北朝“在书牍文的写作上,极大地加强了艺术色彩,仿佛写信不仅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还要骋才华,托风采,叫读信者欣赏一篇美文,于是书信也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必需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之林的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学样式”。③《文心雕龙》中的“书记”更多还是作为应用文体而论述的,而到了《文选》,所录的书信真正开始被作为文学作品对待,符合《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自此,书信作为应用性和文学性兼具的文体,在后世作者创作和文集编选时都不容忽视。

概言之,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书信文体经历了发展与演变消长的过程。先秦时,书信虽有许多别名,但从文体角度看则统称为“书”。秦汉时,传世书信以政治性书牍为主,但私人书信也有留存,且公文如章、表、奏、议等逐渐从“书”体分流出去,公牍与私牍的界限日益清晰。六朝时,书信的文体意识和文学意识开始觉醒,书信文体进一步发展,“书”成为私书的专门文体,笺、奏记、启则介于公牍与私信之间,公私属性和功能尚不明确。此外,六朝之短书与帖虽非独立的书信文体,但皆有重要价值,短书中不乏文辞与情思俱佳之作,是后世尺牍小品的源头,而书信、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杂帖,则在后世单独成体,成为一种文学与艺术合璧的独特书信,即钱锺书所论近似今日之“便条”“字条”者。④ 此时期的书信文化空前发达,不仅文体分类和书仪逐步确立,书信的文学性也受到重视,成为实用性与审美性兼具的文体,语言使用则日趋骈俪。唐代书信承续六朝而发展,书信仍以“书”为文体大宗,“笺”的文体属性一仍六朝,而“奏记”不复存在,“启”进一步发展成致长官同僚之私人书信,到中晚唐时,“状”被纳入书信文体领域,这些皆为唐代书信的新变。书信文体经过汉魏六朝和唐代的演变、分流,已经奠定了基本的种类和体式,其功能属性亦逐渐明晰。

---

①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46 页。

② 《文选》中“书”类共 24 篇,其中包含“移”书 2 篇,本文赞同傅刚等学者的观点,认为“移”为独立于“书”之外的文体。详见傅刚:《〈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415—422 页。

③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2 页。

④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 册,第 1108 页。参见祁小春:《魏晋尺牍中的“短笺”与“长疏”》,《文艺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45—156 页。

二、宋代书帖启状的繁盛与笺的退出

比及两宋,书信文体空前繁盛。据我们统计,《全宋文》中各体书信共有 35541 篇①,远超前代,后世通行的书信程式亦在宋代基本定型。唐末,书信文体主要有“书”“启”“状”“帖”四种,而至南宋时,书信体类增加了简、劄子、叠幅小简、叠幅劄子、尺牍等数种,文体大备,且每一类皆内容丰富、功能明确,言语、书仪等也发育完善并形成定式,对书信文体和书信文学的发展皆有重大影响。

北宋初期,书信文体主要有“书”和“启”两大类,太宗时所编《文苑英华》中有“笺”一卷,只有 9 篇,其中上太子、诸王者 7 篇,次序在“表”后、“状”前,并非作为书信文体,而“启”有 16 卷、“书”有 27 卷,按功用或身份编集,这体现了宋初的书信文体以“书”“启”为主的分类意识。纵观宋代,“书”和“启”仍是主要书信文体,二体书信的存世数量占据书信总数的主体,其功用扩大,语言、程式也进一步定型,可谓空前繁盛。此外,“帖”的发展也异常可观,而“笺”则完全褪去了书信文体属性。

两宋书信文学的“书”体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体现出博杂、包容的特点。经统计,《全宋文》所收“书”体共 14496 篇,占两宋书信将近一半。宋人将书信编入文集时,仍以“书”为主,其中有部分会在标题中写明为“书”,有部分只写明所致对象,未见“书”字,且有一些书,以咨目、禀目、书草、别纸、别幅、别本为名,本文亦作为“书”对待。另外,宋代“上书”极多,官员、学生、百姓均可上书,既有上于皇帝者,亦有上于宰相重臣者,上皇帝者所言多为国家军政大事,通常在文集中属于奏议文,列于公文奏疏后,与私人书信分开,而上宰执大臣之书,则属于私人书信。

“书”体书信承续前代,不仅在名称上较为博杂,在语言、功用和书仪上亦包容多样。宋代之“书”与前代之“书”相同,内容包罗万象,请托求荐、讨论政事、关心亲友、交流文学、辩论学术乃至闲谈戏谑等等,篇幅可长可短。与前代相比,宋代“书”的语言形式更加自由,随时代文风而变。宋初骈俪之风盛行,有些作家的“书”亦多用骈体,如西昆主将杨亿。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书”又发展为以散体形式为主。总体而言,“书”的语言风格由于时代、篇制、对象、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或华丽典雅,或古朴平易,或汪洋恣肆,或简约隽永,或明白如话。但也有特殊的“婚书”,这是宋代的一种礼书,常以骈体行文。书的传统功用在宋代进一步发扬光大,遍布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用以传递信息、交流感情、酬谢赠答、庆吊问候。总之,“书”在宋代仍是书信的主要文体,作品繁盛,风格多样,应用于时人的所有场合。

书信之“帖”在两宋的发展极为繁荣。六朝的“帖”兼具书法和文学价值,具有私交短书文辞省净、情思真挚、富有韵味的特点。严格说来,此类短篇书信仍属于“书”,但因其书法的艺术性,后世在编纂文集时会命名为“帖”,故可视为“书”与“书法”亦即文学与艺术合璧的一类文体。两宋之帖承续晋宋风度,也是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艺术载体,且保存了多样的书信程式信息。

宋代刻帖之风极盛。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刻秘阁所藏法书为《淳化阁帖》10 卷,其后官刻、私刻法帖层出不穷。宋人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读书人,皆热爱书法和法帖,不仅收藏、摹刻前人书帖,亦搜集当代名家(未必以书法著名)之手迹,其中有相当多的书信。风气大盛之下,传世的两宋书信之帖极多,称书信为“帖”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全宋文》共收录 2182 篇,是除“书”“启”“劄子”之外最多的一类书信。留存的宋人书帖一般为日常往来书信,由写信人亲笔书写,篇幅短小,语言大多为散体,较为口语化,文本多保留原始面貌,包括称谓语、落款等。不同于书启以收信人信息及书信主题为标题内容,帖的命名可以截取自书信内容,如蔡襄《澄心堂纸帖》,就是截取书信正文第一句为题。

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等 2006 年版。其中北宋时段的数据来自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 30 页。金传道论文统计截止《全宋文》第 132 册,本文涉及两宋书信统计者,其中《全宋文》前 132 册的统计数据皆参照金传道论文数据,金文统计耿南仲书信时遗漏一篇帖,本文已补入。南宋时期(第 133 至 360 册)的数据由我们统计得出。另外,两宋各体书信皆以《全宋文》收录时篇名所示文体为准。

启是两宋书信中的另一大体类,《全宋文》中“启”类书信共有 13856 篇,数量几与“书”匹敌,而且到了南宋,“启”的数量甚至超过同时段的“书”。与“书”的包容博杂不同,“启”的文体属性从产生时便有上于尊者、偏于公事、重视礼仪的特点。

启在宋及以后是最主要的应酬书信文体,但在六朝时是一种与表奏相类似的公牍。由于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两汉无启①,晋代以来始盛行,其文体性质与表奏相通。萧统《文选》将“启”单列一类,且置于“上书”之后、“弹事”之前,内容为臣子致君主或执政者之书牍,并非私人书信。但此时该体类的写作已形成定式,开头为“臣某启”,中间陈述政事,最后表达谦卑惶恐之情,结尾常用“谨启”。南朝的启,除上呈皇帝“陈政言事”之外,“让爵谢恩”功能开始突出,涌现出大批谢启,又偶用作上尊者之信,启的文体功能进一步扩大。刘宋之江夏王刘义恭、鲍照最先作谢启,如刘义恭《谢赐金梁鞍启》、鲍照《谢赐药启》等,此外如鲍照《通世子自解启》《重与世子启》,更大程度上属于私人书信,只是致信对象身份尊贵。谢启和私书启均是启之文体功能的扩大和转变。齐梁时人常以启答谢帝王之恩赐或致信于尊者,启的礼仪性和私人性愈益加强。

逮至初唐,启的文体属性经历了第二次改变,它作为表奏之分支、向帝王陈政言事的属性逐渐淡化,并实际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致长官同僚的书信文体。初唐王勃、骆宾王之启,承六朝骈化倾向,以四六体为主,中晚唐则骈散兼行,如韩愈、柳宗元、杜牧之启,语言以散体为主,而晚唐温庭筠、罗隐之启,仍以骈体为主。以骈俪行文乃晋唐启文之主流和常态。格式上,唐启常直接以“某启”开头,不加“臣”或官职名,结尾以“谨启”落笔。与六朝之“启”相比,作者和受者双方的地位差距较小,尊卑等级观念弱化,其所致对象范围也逐渐下移,不再上行于皇帝,仍可上行于太子诸王,但更广泛用于致长官同僚,甚至可用于身份地位相当者与朋友之间,内容有涉及军政之事者,亦有私人庆贺答谢、干谒请托之类。②

比及北宋,启进一步发展为上师长同僚、答下属后学的应酬性书信文体。此体本具正式、讲究、尊崇的风格特点,故一般用于礼仪性强的庆贺答谢,或用于关系较疏远之人以表敬意。关系亲密之师友,倘在日常往来中使用启,则会显得生疏客套,反而有损情谊,欧阳修《与陈员外书》就批评了这种风气。③启有自作,有代他人作,内容则涉及士大夫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士人科举中第要写谢启致主考官,他人仕途升迁要写贺启以表祝贺,逢各大节日如冬节、元旦,官僚师友之间互赠贺启以为祝福,另外,祝寿、干谒、求婚等亦可用启,启是士大夫与师长同僚来往应酬的重要礼仪文体。这是宋代启文的核心功能,正如周剑之指出的,它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影响着士人阶层内部的沟通与交流。④

在语言和格式上,宋代散体之启虽有少量作品,但并非主流⑤,绝大多数的启都是整饬的四六体式,如四库馆臣所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⑥,文辞华丽,多用典故,形式之美发展到极致。宋代启文的语言风格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如曾枣庄所论,宋初之启受五代文弊的影响,文风靡弱,而北宋古文革新后,启多平易流畅,至南宋后期流于纤弱,至南宋灭亡之际,又多慷慨激昂之作。⑦

启在宋代得到充分发展并定型,被作为士大夫交往应酬的重要书信文体,宋人编文章总集一般都会

---

① 刘勰:《文心雕龙·奏启》,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第 318 页。

② 参见吴丽娱:《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 年第 5 期,第 17—20 页;钟涛:《试论晋唐启文的体式嬗变》,《文学遗产》2007 年第 4 期,第 134—139 页。

③ 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17—1819 页。

④ 周剑之:《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第五章《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0—93 页。

⑤ 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五八保留了几篇散体启文,曾枣庄在《论宋启》(《文学遗产》2007 年第 1 期,第 47—57 页)中曾以司马光《上庞丞相启》为例说明宋代启也有散体。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四六标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下册,第 1396 页中栏。

⑦ 曾枣庄:《论宋启》。

选入,如吕祖谦《宋文鉴》便编有启文三卷。此外,南宋涌现的一批“四六”专集,如王子俊《格斋四六》、赵汝谈《南塘先生四六》、李刘《梅亭先生四六标准》等等,专收以“四六”为体的表、笺、启,由此亦可见“启”作为应用文体的盛行。

“状”作为书信文体始于唐代。“状”本为上国君之公文,按功能分论事荐人与庆贺谢恩两类,与早期作为公牍的启相似,偶亦用来上宰相或三省六部。至中晚唐,“状”的文体功能扩大,开始带有书信性质,所致对象为宰相、尚书等高级官僚,如韩愈《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潮州谢孔大夫状》、刘禹锡《苏州上后谢宰相状》、杜牧《上郑相公状》《上吏部高尚书状》,以及李商隐的众多代作及自作状,内容多为荐举、庆贺、答谢、问候,可视为官场往来之书信。欧阳修《与陈员外书》曾论及“状”之用于私人书信的情况:“其原盖出唐世大臣,或贵且尊,或有权于时,缙绅凑其门以傅。向者谓旧礼不足为重,务稍增之,然始于刺谒,有参候起居,因为之状。及五代,始复以候问请谢加状牒之仪,如公之事,然止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①简论“状”从公事流为民俗的过程,大致准确,惟将转折的时代断为五代则不够周密。从出土的敦煌文献看,晚唐河北等地已出现普通人因日常问候或家庭琐事而写“状”的情况,则最迟在晚唐时,普通百姓之间也已使用“状”来进行日常通信。②

“状”之用于私人书信,是以其文体本身的尊贵性来增加礼仪程度、凸显尊崇之意,其格式类似致长官同僚之启,内容范围亦相近,以言事、庆贺答谢、干谒、私人交往为主,此类“状”逐渐成为书信文体之一,与“启”的文体属性多有重合。至宋代,启、状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称、通用,但二者的文体属性仍有不同。同是从公文奏牍流衍为私人书信,启在宋代已经完全作为书信文体之一,不再承担上书言事之功能,而状仍可作为公牍上于皇帝,亦可作为“申状”上于上级官僚、朝廷部门,其公文性质仍在,《宋人佚简》中保留有多篇南宋舒州酒务“状”的原件,可见其公牍性质和程式。③ 正如论者指出,“公文中的《申闻状》及《划一申禀状》在程式上皆与私人交往的书信区别不大”。④ 宋代官员多有到任或迎迓之状,即官僚到某地之前发状给当地官员以表通问,或当地官员致状到访官员以表迎候之意,一般内容简短,亦作骈体,苏轼文集中有先状、到状四篇,为到任前、到任后致监司、同僚之状,如《湖州上监司先状》:“弭棹江郊,耸闻风采。驰神德守,若奉诲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⑤篇幅简短,只有六句,皆为整齐的对句。此外,“状”亦可作为私人呈递宰执以论公务之书信,此类状一般为散体,如汪应辰《请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钱状》⑥,语言形式、文体属性与上宰执言事之“书”无异,是为特例。总体而言,宋代之“状”除了上于帝王之外还有两类,一类为致官僚师长以候问请谢之书信,文体性质与“启”相通,另一类为言说公务之文书,保留了“状”的公牍属性。

与书帖启状的大发展大繁荣相反,“笺”在宋代大大萎缩。徐师曾论笺称:“古者君臣同书,至东汉始用笺记……是时太子诸王大臣皆得称笺,后世专以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称表,皇后太子称笺,而其他不得用矣。”⑦此处“后世”的起点即在宋代。“笺”在唐代还可作为书信文体,偶可致宰相,到宋代则基

---

① 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八,第 1818 页。

② 详见赵和平:《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5—209 页;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42—243 页。

③ 详见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 5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夏玉琛:《试析南宋的几种书信程式及其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5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28 页。

⑤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校注》卷三三,《苏轼全集校注》第 16 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89 页。

⑥ 《全宋文》第 215 册,第 34 页。

⑦ 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23 页。

本退出书信文体家族,成为专致太子、诸王、太皇太后、太后、皇后、太妃的公牍文体,其所致对象逐渐固定,内容则从公私兼备逐渐转为以公文为主,且多为礼仪性的庆贺答谢,行文多用整齐的骈体。因其所上对象的特殊性,一般作为公文收录在表状之后,而非私人书启之中。但也有例外。北宋蔡襄有《致昭文张相公笺》,今人认为这是"臣下之间亦偶而用笺,当属特例"。① 又,苏辙之孙苏籀《双溪集》中保留了 29 篇笺,与启相杂,实为启,也是宋代文集中的特例。除此之外,他处未见。由此可见,"笺"在宋代已经明确不是书信,虽在日常生活及书信语言中仍会称书信为"笺",但只是作为一种美称或者构成双音节词的词素,一般不再作为书信标题和文体。

三、简与书的分离及劄子的文体转化

宋代书信文体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书帖启状的繁盛,更体现在新的书信体类的独立和创新。

"简"在宋代之前只是书信的别称,并非专门的体类,宋人开始注意"书"与"简"的区别,在编纂文集时已有文体上的考虑,将"简"从"书"中分离出来,单独称"简"或"小简""手简"。

宋代之"简"大致有两类,文体属性不尽相同。第一类为简短随意、散体行文的书信。"简"最初指写字的竹片,引申为指书写材料,后成为书信之别名。《说文解字 · 竹部》:"简,牒也。"段玉裁注曰:"按: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牒、札,其通语也。"②由于作为书信的简通常篇幅短小,故"简"也是简短书信的代称,如徐师曾所言,"简者,略也,言陈其大略也,或曰手简,或曰小简,或曰尺牍,皆简略之称也",且"简用散文"。③ 试以杨亿为例,其"书"与"启"皆以整饬的骈体对语为主,但《上二相手简》则用散体,且语言非常口语化,盖因所言正事"已具状奏闻"④,手简只是对正式书牍的补充,情感色彩浓厚。在书仪上,简的程式也较为简略。此外,简通常为写信者亲书,文集中称"简",更多的是表示其手书形态和原始面貌,如黄庭坚《山谷简尺》所收录的 2 卷简。书与简的形制区别,如吴曾祺所言,"书则长短并宜,简则零篇寸楮为多。"⑤"简"之为体,不如"书"正式,多是日常往来的亲笔书信,可作为正式书启的补充,虽在内容上也涉及公私大小事务,但篇幅短小,直陈其事,行文随意,散体为文,语言较为口语化,曾枣庄谓"简比书更随意,多拉杂叙事"⑥,所论中的。

与此属性相同的宋代书信体类还有"柬"和"札"。两宋以柬、札为名的书信并不多见,但文集中"简""札""柬"的命名与分类,表明宋人有意识地将"简"与"书"分离,是文体分类精细化的表现。

北宋末南宋初出现了第二类的简:小简。这与北宋末年以降书仪的变化及"双书"形式的出现有关。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 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后复止用双书,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⑦

据此可知,北宋末,世风崇尚谄媚阿谀,时人致长官权贵之书信力求礼仪毕备,作启时又手写一通书信,作为骈俪启文的补充,手书与启一起寄出,因以启为主体,故称手书为"小简",二者分别封口、各为一件。不久,由于担心文书吏员不能将二者全部送达,作书人又将二者合并封在一起,一函信件里包含两

---

①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 15 页。

②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经韵楼刻本,第 190 页下栏。

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 128、129 页。

④ 《全宋文》第 14 册,第 356 页。

⑤ 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文体刍言》,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册,第 6644 页。

⑥ 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3 页。

⑦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7 页。

种书信,称为“双书”。到南宋前期,小简篇幅越来越大,甚至多至十幅,故日用类书中亦谓之“叠幅小简”。① 南宋此类“小简”甚多,《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以下简称《播芳大全》)收有 7 卷“叠幅”,皆为叠幅小简。不同于第一类“简”简短随意、散体行文的特点,此类“小简”篇幅冗长、特重礼仪、语言繁复,骈、散语兼有,多用套语,辞气卑下,礼仪功能增强而表意功能减弱。

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书信体类——劄子。“劄子”本是宋人陈政上疏之体,属于奏议文,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式公牍,徐师曾所谓“乃一代之新式也”。② 欧阳修概括其源头和应用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劄子,中书、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③在宋代,劄子最初是官员向皇帝或长官进言议事的一种上行文书,后又发展为下行文书,官府可用来发布命令,至南北宋之交,劄子又增加了书信功能,到南宋初期的绍兴年间,书信劄子已被广泛使用,《宋人佚简》就保存了十多件绍兴末隆兴初的劄子实物。④ 综合现存宋代文集与文献资料可知,劄子的作者和受者群体确实在两宋之际逐渐下移,至南宋初期则已作为私人书信使用。书信体劄子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政事公务和私人交往。北宋末,劄子已可用于向宰执言事,如汪藻《浮溪集》卷二一有靖康元年三月所作《上宰执乞道君还阙劄子》,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二七有《上何丞相劄子》两篇,与上尊者书同,可视为书信。至南宋初期,劄子已可用于私人书信,如赵鼎《郡寄帖》,其落款为:“特进知泉州军州事赵鼎劄子。”徐邦达认为:“宋代劄子形式,最早见此帖。”⑤此论广为人知,《郡寄帖》甚至被视为最早的书信劄子,但并不严密,倘说此帖为宋代日常私人书信性质之劄子形制体式的最早实物,则更为准确,盖此前已有上宰执言事的书信劄子。此后,劄子用于私信的现象逐渐普遍,其书信文体属性进一步扩展,不仅可用于上宰执大臣,亦可致同辈,不仅可言公事,亦可作日常交流。由于是从公牍发展而来,其形制保留了部分公牍特点,如结尾落款格式为“右谨具(申)呈”,再署日期、写信者官职全衔,后加“劄子”或“劄”。⑥ 另外,劄子封面也要具全衔,传世程元凤《提举郎中帖》实为一篇书信劄子,封面上有“劄子拜呈提举洪”字样,封面正中书“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程(中钤朱文‘元凤’一印)谨封”⑦,可见劄子封面形制亦有公牍特点。书信体劄子在南宋数量暴增。作为私人往来书信的劄子,既有用于日常交流者,也有用于官僚士人间庆贺答谢者。后者骈散兼具,用语恭谨,功能类似启状,甚至可用作婚劄,南宋后期较为常见,如陈著《本堂集》之劄多为骈体,数量可观,婚劄和问候馈答之小劄俱存。

作为书信的劄子亦可分为普通劄子与叠幅劄子,前者即如上述,后者颇受研究者关注⑧,系由“叠幅小简”发展而来。前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在谈及双书中的小简在南宋发展至十幅之后,续云:“人情厌患,忽变而为劄子,众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⑨赵彦卫《云麓漫

---

① 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影印明初刻本,第 169 册,第 39 页上栏。参见宋坤:《宋代“双书”书仪文式研究》,《山西档案》2015 年第 1 期,第 141—145 页。

②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 124 页。

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 1 编 5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2 页。

④ 详见魏琳:《〈宋人佚简〉所收劄子之初探》,《山西档案》2015 年第 1 期,第 127—131 页;邬志伟:《论宋代奏事制度中的奏劄写作》,《南京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31—143、159—160 页。

⑤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第 2 册,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2—673 页。

⑥ 有关劄子的形制特点,参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全宋笔记》,第 6 编 4 册,第 138 页;吕书庆:《宋代劄子及其书信形制考叙》,《中国书法》2006 年第 12 期,第 21—25 页。

⑦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第 3 册,第 1042 页。

⑧ 如魏琳《〈宋人佚简〉所收劄子之初探》即以《宋人佚简》中所收劄子为例,分析各种叠幅劄子的形制特点;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重点关注的也是叠幅劄子。

⑨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第 37 页。

钞》亦载秦桧主政时叠幅劄子的变迁情况:“秦忠献当国,有投以劄子者,其制,前去‘顿首再拜’,而后加‘又谨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劄子多至十余幅,平交则去‘申’字。庆元三年,严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后又只许用一幅,殊为简便。”①可知“叠幅劄子”是从“叠幅小简”演变而来。虽然后来只许用一幅,却又发展出“提头劄子”。宋末元初刘应李辑集的日用类书《翰墨全书》“启劄”类之“劄子”体下,连续列有七种程式套语,编者在后面解释说:“此叠幅简之变式。盖叠幅既繁后只用纸一幅开写,每一段一提头,有五提头、七提头至九提头,谓之提头劄子,条目铺叙,一如叠幅。”②一提头即为内容完整独立的一段,相当于叠幅中的一幅,每段内容及功用不同,组合在一起,“形式上虽只有一纸,但所写却是原来叠幅小简的内容”。③ 文渊阁四库本《播芳大全》卷五五即收录有数篇叠幅劄子,《翰苑新书》别集卷一至卷六所录劄子,其体制亦为叠幅劄子。南宋时此类叠幅劄子甚多,体现出一时的书信礼仪与官场风气。如周煇所论:“自行劄子,礼虽至矣,情则反疏。”④叠幅劄子过于注重礼仪,虚浮繁复,散发着官场谄谀逢迎风气,故明人徐师曾斥为“烦猥可鄙”。⑤

“劄子”文体性质的转变过程与启、状类似,皆是从官府公文扩展为私人书信,本意是借其文体之高贵以表尊敬,体现出古代书信崇礼尊体的意识。“叠幅劄子”的盛行,则是崇礼意识的过度膨胀,虽有“烦猥可鄙”之嫌,但毕竟曾盛行一时,也是当时官僚、士人、庶民交往风气的产物。作为书信的“劄子”是宋代书信百花园的新品种,《全宋文》共收录各类书信劄子 2250 篇,是除书、启之外数量最多的书信体类。南宋至元,不仅一些总集、类书大量收录书信劄子,甚至出现了直接以“启劄”为名的一大批总集与民间日用类书,如南宋熊晦仲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元代吴弘道编《中州启劄》,不著撰人的《新编事文类聚启劄云锦》《启劄青钱》《启劄渊海》等。明修《永乐大典》“劄”字韵下曾抄录大量宋元人信劄及套式,今存卷二二七四九——二二七五〇、卷二二七六〇——二二七六一,前两卷录自南宋《启劄云锦裳》,后两卷抄自《启劄锦语》,皆为各阶层用于庆贺、慰吊、荐托、借还的书信,其中多见叠幅劄子,包括吊丧也不乏三幅、五幅劄子,以及“五提头慰劄”⑥,具见书信体劄子及叠幅劄子在宋元的流行。

需要指出的是,叠幅小简与叠幅劄子虽系由多幅或数提头组成,但应视为完整的一篇书信,文集编纂时极易把叠幅拆成数篇收录。以《全宋文》为例,是书对于此类叠幅小简的处理方式并不统一,有时作为一篇收录,有时又拆为数篇。如卷三三八〇所收汪藻 18 篇小简,系将四库本《播芳大全》卷五六中《上丞相小简》2 篇拆为 14 篇、《贺刘丞相小简》1 篇拆成 4 篇而来;卷三八一一所收赵鼎 6 篇《上宪使小简》,辑自《播芳大全》卷六〇,其实本为一篇叠幅小简。⑦ 另外如孙觌之帖、晁公遡之柬、劄,不少也是由叠幅拆分而来。此类现象极多,本文统计时虽将这些拆分的小简暂算为单篇,但仍认为应将完整的叠幅视为一篇。

“简”从“书”当中分离出来,与柬、札同为短小随意的书信,“劄子”从公务文书演变为私人书信,“叠幅小简”与“叠幅劄子”盛行于南宋,这些都是宋代书信体类的创新性发展。

四、作为一代书信文学标识的“宋人尺牍”

所谓尺牍,本义为一尺长的木简,作为早期书写材料,最先泛指书写在尺牍上的所有文字,故早期有公文与书信等多种所指,后来逐渐演变为书信的别称。然而,到了宋代,尺牍在书信的泛称之外,又收缩

---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第 138 页。
② 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四,第 39 页。
③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 22 页。
④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479 页。
⑤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 128 页。
⑥ 《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7930 页。
⑦ 《全宋文》第 157 册,第 166—174 页;第 174 册,第 327—329 页。

意义范围,特指一类私密随意的专门书信。故尺牍在宋代有三种含义:广义上指代一切公私书牍,狭义上指私人往来书信,更狭义的则具体化为非正式、私密、随意的书信。许多书信研究论著对尺牍含义的历史演变和文体属性认识不够清晰。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是研究中国书信的通史之作,自称其书所言尺牍"是书信的代称"。① 但就宋代书信的各种体类而言,尺牍之称是涵盖不了全部书信的。金传道概括道:"简、札、帖、劄子均为书之短者,可概言之尺牍,与上书、奏记、笺同属书类。"②按诸宋代实际情况,仍有出入,尺牍的形制虽与上述书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通性,但文体性质和使用范围存在区别,并不能以尺牍涵盖。付梅《北宋尺牍研究》认为:"随着文体发展的完善、分工的精细,尺牍内容范围日益收缩而至于成为私人往来书简的统称。"③实际上,尺牍的文体内涵与私人往来书简仍有不同,需要细加辨析。

尺牍在宋代逐渐从"书"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一种专门的书信亚文体。尺牍有时也称作小简、手简,与简、帖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很多帖、简甚至劄子确可称为"尺牍",如《播芳大全》中"尺牍"一类皆为"帖"。但不能因此而将尺牍与体制短小的简、札、帖、劄子等书信相等同。"尺牍"与"书"的不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新文学作家周作人在介绍宋人尺牍选集时就将"书"与"尺牍"分别讨论。④ 当代研究者更明确了二者的区别。浅见洋二指出:"在考察宋代所编文集中书简的处理问题时,应该明确一个宋代特有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书'与'尺牍'的分离与区别。即使二者都被通称为'书简',但是其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有形形色色的分类方式,但至宋代尤其是南宋,作为一种文集编纂的方法,'书'和'尺牍'的区分才真正变得明确。"⑤他从"公"与"私"的视角来看待"书"与"尺牍"的分离,"书"偏指公开性的书简,而"尺牍"更倾向于私人性、私密性的。艾朗诺(Ronald Egan)也曾提醒注意苏轼"尺牍"与"书"的分离,将苏轼的尺牍称为"informal letters"(非正式书信),从正式与非正式的角度来看待"书"与"尺牍"的不同。⑥ 朱迎平更具体地分析了"书"与"尺牍"的区别:"'书'多用来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往往用于正式的场合;'尺牍'则篇幅短小,使用随意灵活,常用于朋友间的日常交往。"⑦私人、私密、随意、非正式、日常化,这些都是"尺牍"区别于"书"的显著特征。

宋人别集总集编纂的变化体现了"尺牍"文体的独立过程。如苏轼别集,最初的《东坡集》及《东坡后集》对书信只收录启状和书,东坡尺牍到南宋时才被辑佚并编入文集之中。苏辙亲手编订的《栾城集》,亦不收尺牍。不难发现,北宋人已经注意到"书"与"尺牍"的区别,那些即时写下、简短随意的私人尺牍不受作者重视,不被作为可以传诸后世的"不朽"文字,大概亦未留底稿,故不收入文集。南宋士人自编文集时仍存在这种摒弃"尺牍"的情况,如陆游《渭南文集》,"收录'书'体九首,却摒弃了大量的尺牍之文"。⑧ 尽管如此,南宋已是尺牍与"书"分离、取得独立并被收入文集的重要时期。南宋人宝爱名人书法作品,致力于搜集名人尺牍,并编入其别集之中。譬如,据多位学者考证,汪应辰汇编苏轼写给亲友的书信和诗文等墨迹,摹刻上石,是为《西楼帖》,其中一部分为此前《东坡七集》所未收,这是首次大量地汇编摹刻苏轼尺牍,影响深远,陆游还曾"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明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原编成于南宋,其中卷六三至八一为"小简",此"小简"即他书所谓尺牍。元刻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明末茅维编刻《苏文忠公全集》75 卷,在启状、书之后,专列"尺牍"一类,自卷五〇至六

①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第 1 页。

②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 24 页。

③ 付梅:《北宋尺牍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 页。

④ 周作人:《五老小简》,《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 1934 年版,第 141—147 页。

⑤ 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 年第 5 期,第 72—84 页。

⑥ Ronald Egan:"Su Shi's Informal Letter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Antje Richter,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5, p.475.

⑦ 朱迎平:《〈渭南文集〉编纂体例发微》,《新宋学》第 8 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01 页。

⑧ 朱迎平:《〈渭南文集〉编纂体例发微》。

一,总数近 1300 通。① 这些作品都源自南宋人对东坡尺牍的搜求编集。尺牍也在此时被单独作为文类编入总集或选本,如《播芳大全》专列“尺牍”一体,选本如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载《本朝尺牍》,《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溪堂师友尺牍》6 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著录的《艇斋师友尺牍》2 卷。甚至还出现单独编辑注释个人尺牍的专集,如李祖尧编注孙觌尺牍,今仍存宋刻本《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16 卷。② 可见“尺牍”的文体特殊性在南宋已得到确认。

尺牍从“书”中分离出来后,便有了专属的含义和特征。简而言之,“尺牍”特指宋代士人交往中私密性的、非正式的书信,这类书信往往施于亲友之间,多谈日常琐事,极具生活气息,篇幅短小,书仪、用语较为随意,以散体为主,不必讲究辞藻、典故,以平常语言书之,甚至可以大量使用口语,行文散漫,本不作为文章而书写,但往往涉笔成趣,颇见性灵,故为后世所重。钱锺书曾赞赏唐宋以降在笔记、书牍中相沿不绝的“自由自在的家常体”文字,又以桐城派论“古文”要避免“尺牍气”,反证尺牍与古文的不同。③ 可见在语言风格上,宋代的“书”多用散体古文,“尺牍”则介于骈散雅俗之间,活泼自在。宋代产生了一批尺牍大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孙觌,他们的尺牍作品为后世提供了格式与典范,《群公小简》(《五老集》)及《欧苏手简》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流行即为明证。④ 在他们的影响下,元明清三代涌现出一大批尺牍作家及尺牍专集。苏黄尺牍是晚明尺牍小品的先声,这已是文学史的常识。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也受到宋人尺牍的启发。现代散文主张言、文合一,特重个性的真实流露,虽然批评传统古文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但对尺牍却青眼有加。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写信“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⑤ 周作人曾点评《五老小简》(《五老集》)中的宋人尺牍,说苏轼尺牍“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最后总结道:“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畤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⑥在《关于尺牍》里,他又认为:“所以讲起尺牍第一总叫人想到苏东坡黄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论,的确也是这两家算最好,别人都有点赶不上。”⑦他反复研读古人尺牍,欣赏宋人尺牍之个性自然、文情俱胜,反对古文的造作,推崇苏黄尺牍,用宋人尺牍为新文学张目,他本人的尺牍写作也成绩斐然。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在现代书信方面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书信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书信的风范,增添了他散文创作的丰富性,烘托了他作为现代一流散文家的地位。”⑧可见,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端发展过程中,宋人尺牍的影响不容忽视。

五、结　论

以上本文辨析了两宋各体书信的内涵、特征和发展状况。宋代主要的书信体类有书、帖、启、状、简、叠幅小简、劄子、叠幅劄子和尺牍。其中书和启是最主要的书信文体,简、劄子和叠幅小简、叠幅劄子是文体的新发展。总体而言,“书”之一体,包容万象,公私兼有,“帖”通常为私人往来书信的保存,“启”

---

① 详见朱刚:《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苏轼苏辙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5—82 页;陆游:《跋东坡书髓》,《渭南文集》卷二九,《四部丛刊》本;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741—745 页。

③ 钱锺书:《近代散文钞》(书评),《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20 页。

④ 参见朱刚:《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上海:上海三闲书屋 1937 年版,第 246 页。

⑥ 周作人:《五老小简》。

⑦ 周作人:《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 1937 年版,第 178 页。

⑧ 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1 页。

“状”是公共交往的礼仪性极强的体类,“简”是书信之短小随意者,在宋代可单独作为书信体类,“劄子”从公文转变而来,内容上公私兼有,行文上骈散兼行,南宋后又发展出一种特重礼仪性的“叠幅小简”“叠幅劄子”。此外,“尺牍”作为私密性、非正式的书信,与“书”逐渐分离,并在南宋被作为独立的体类广泛收入文集之中,或单独刊行。各体书信在宋代的分工愈加明确,并逐渐定型,各有其功能、书仪和语言风格。

从历时性看,宋代书信文体承续六朝唐代,但发生了许多变化。“书”仍是主要书信文体,“帖”也大受重视,传世极多。“笺”在宋代已不再是书信文体,而唐代始盛行的“启”和“状”在宋代得到继续发展,尤其是“启”,因其应酬性、礼仪性强,与宋代士人仕宦及“举世重交游”之风密切相关①,故而应用频繁,发展极盛。由此,宋前的四种书信体类,在宋代获得充分发展,并逐渐定型。“简”与“书”的分离,“尺牍”的独立,“劄子”“叠幅小简”“叠幅劄子”的兴起,则是宋代书信文体的新变。纵观两宋,北宋对前代书信文体有发展定型之功,南宋则多有转变与创新之处。随着书信文体的丰富和成熟,书信的文学性和文章学地位亦得到提升,宋人重视对书信的收集整理,不仅收入别集、总集、类书,还专门辑录刊行包含某类书信的总集,涌现出一批尺牍小集和四六专集,书信的实用性与文学性皆得到强调。至此,传统书信的文体种类已经完备,文体程式已经定型,书信文学的发展盛极一时。宋代书信的成就在后世广受推崇,在文体上具有典范意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tegories of the Epistolary Genre With its Innov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Li Gui, Zhang Li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full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pistolary genre. Its main categories included correspondence (书), calligraphic letter (帖), courtesy letter (启), private letter written to one´s superior (状), short letter (简), official letter submitted to one´s superior (劄子) and informal letter (尺牍). Among them, correspondence (书) was still the chief category of the epistolary genre. Calligraphic letters (帖) were greatly favored, with many of them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Official letters to the emperor or the royal family members (笺) no longer belonged to the epistolary genre. Courtesy letters (启) and private letters written to one´s superior (状), which were initiat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Song Dynasty. Courtesy letters (启) were frequently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social intercourse and ceremoniousness. They we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literati and officials of the Song Dynasty liked to make study tours and make friends. The epistolary genre of the Song Dynasty had the following changes: Short letters (简)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category of correspondence (书); Informal letters (尺牍) became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Official letters submitted to one´s superior (劄子) were transformed from official documents into the epistolary genre; and there arose “folded short letters”(叠幅小简) and “folded official letters”(叠幅劄子). As people in the present-day society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distinctions of various categories of the epistolary genr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y are liable to make mistakes in sorting out the letters left over from the Song Dynasty. Taking a general view of the two periods of the Song Dynasty, we find that in the Northern Song, development and full formation were made in the epistolary genre on the basis of the achievement made in its previous dynasties, while in the Southern Song, a great deal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made in the epistolary genre.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won widely admiration in later centuries, became the epistolary paragons, and also promote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etters of the Song Dynasty; genre and category; official letter submitted to one's superior (劄子); informal letter (尺牍)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范质:《诫儿侄八百字》,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四,《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